

第二章 时代背景的比较

第一节 社会背景的比较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以较为彻底的革命方式摧毁了封建制度，而工业革命的发展又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使其不断地壮大成熟。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一部殖民掠夺的历史，西方殖民者为了争夺更多的原料和商品市场，为了自身利益和原始资本积累，从资本主义制度初步形成之初，就开始了对东方的侵略与征服。而与此同时，由于东方各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形成了巨大差异，其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就造成了东方的近代化是以殖民地化作为代价，其所谓的近代化并非国家政治与经济自然发展之结果，而是被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框架内。

在世界近代史上，当东方各国还停滞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体制之下时，西方却已经实现了“工业革命”，并开始了其疯狂的扩张侵略。十九世纪初，他们的魔掌已经相继伸展至亚洲各国。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由此中国紧闭的国门被迫洞开。由于当时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政策以及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无知，封建统治者们从一开始就低估了侵略者的野心和能力，更谈不上寻求相应的战略与对策，可想而知，战争的结果自然就是向西方列强求和，最终以巨额赔款而求得短暂“太平”。然而，这些沉重的财政重担都被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于此加速了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恶化；另一方面，中国领土的完整也横遭破坏，英国不但强占了香港，还强迫中国开放多处对外通商口岸，中国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也由此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不断助长了西方列强的嚣张气焰，乃至19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掀起了一

股瓜分中国的狂潮，连东亚近邻日本也不例外。1894年由于日本的挑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最终导致清朝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战争又一次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翌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开始由商品输出和大规模武装侵略转变为资本输出，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社会矛盾也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所构成的两大主要矛盾。

相较于中国，西方殖民者进入东南亚国家的时间要更早一些。1824年，英国就对泰国的邻邦缅甸发动了第一次殖民战争，虽然没有直接侵入泰国，但也迫使泰国当时在位的三世王（1824-1851）与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泰国的部分主权也因此被殖民者所掌握。如果说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鸦片战争是试探性的，那么对东南亚的侵略就是肆无忌惮的。缅甸、菲律宾等许多国家在殖民者入侵后很快就沦陷为殖民地，泰国虽然是东南亚唯一在形式上保持独立的国家，但实际上也是以国家主权和领土丧失作为代价，其实质是与中国类似的。但是，与中国相比，泰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相对于中国当时的统治者，他们的愚昧腐朽、软弱无能，且恰恰又有点偏激地自以为是的“大清国”心态，而泰国统治者似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较清醒的头脑，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则依赖于他们的西式教育背景及开放的视野。泰国王室一向都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西方之长，王室子弟一般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教育。四世王时期（1851-1868），就在皇宫里设立学校，教授英文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为王孙公子留学国外奠定基础。四世王还鼓励外国人办教会学校，皇家也鼓励官员出国学习考察。1877年，泰国第一所官方创办的皇宫学校成立，皇家文牍厅副厅长被任命为校长，学生来源于王子、王亲、贵族高官的子弟。五世王（1868-1910）下令在教授泰文的同时教授英文课程，以便日后从事涉外工作。通过不断学习，皇室了解了西方资产阶级发展与强大的源动力，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故此，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统治者能够较清醒地寻求救国之法，通过自身自觉变革，使泰国尽快走上了民族资本主义道路。如1824年泰英签订的《伯尼条约》，虽然让英国商人从中获得了“贸易自由权”，但是泰国政府在条

约中声明不同意将鸦片输入泰国，皇家还保留了大米等商品的垄断权。从中可以看出，泰统治者对西方殖民者一开始就有着警醒认识。在三世王逝世前不久，他还曾经这样警示过后人：“缅甸、高棉、安南的战争看来不必再担心了，现在应该注意的倒是洋人”。1851年三世王驾崩后，四世王（1851-1868）即位，这位一直生活在佛门的国王一直努力学习从欧美传来的新学问，还从美国传教的教父那里学会了拉丁文和英文，并以此为工具，学到了更多的近代西方文化。同时通过阅读英文书报，更扩大了眼界。因之对本国和西方文化及思维方式的熟稔，使他对国际国内局势了解得更为透彻，他深知周边各国都先后沦为英国、美国、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后，泰国的命运危在旦夕，而后在与殖民者的周旋中，四世王尽可能地在夹缝中维护着国家独立，同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由上而下的多项变革，积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并适当地开放国门。但是，这种变革毕竟不够彻底，且缺乏经济基础作后盾，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从统治阶级内部发起变革，实质上并没有触及到其专制统治制度本身，终究为其封建统治服务之初衷未变。因而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泰国弱小的国际地位。1855年，泰国又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英暹条约》，并被控制了国防和贸易，英国享有治外法权，泰国因此丧失了很大一部分独立和主权，从而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

其二，弱小的泰国之所以成为东南亚国家中唯一一个保持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其国力的真正强大，这一点从前述中可略知一二。同时笔者以为如下一些资料可加以佐证，当年和泰国人签订通商条约的英国大尉伯尼说过：

“暹罗（泰国原称，1939年后改称泰国）在同像英国这样一个海上强国的关系中是极其脆弱的。只要同马来人一起使一点劲，就可以割取下暹罗……从典那沙冷出动的军队可以通过任何山隘进入暹罗的心脏……”。泰国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除了统治阶级的周旋和帷幄之外，也与英法两国在东南亚的利益相联系：他们各自都想独占东南亚，但是另一方又绝对不会妥协，所以泰国成了他们的矛盾缓冲国。英法两国曾经在1896年和1904年就划分东南亚的势力范围签订过两个条约，其中就明确规定“双方应该保障暹罗的‘独立’”。故此，泰国特

殊的“国际地位”使得泰国的皇室也有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在民族危机中诞生的五世王受其父王四世王的影响，从小就学习英文，接受了西方教育，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社会制度对他影响很深。他洞察到整个国际环境及泰国的现状，在执政（1868-1910）期间，面对殖民者的侵略和民族的危机，效仿西方，在政治、经济等一些方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改革，力图使泰国尽快进入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这次改革，应该说在各方面都加速了泰国实现近代化国家的进程，尽管它还是以泰国的殖民地化作为前提的：基于经济基础的落后，政治上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宗主国绝对不会提供给他们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经济上也不可能任其健康发展，故此泰国的社会变革是不彻底的。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勾结封建主义，封建官僚掠夺财富发展成为官僚资本，二者均成为泰国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者。由此在艰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着两面性和软弱性的特点，他们领导的维新和革命都以妥协与调和而告终。同时，因泰国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泰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意识，社会上留存着盲目“乐观”的情绪，人们看不到封建统治下的各种流弊，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的侵虐罪行。尽管其后在1932年爆发了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但是旧思想、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社会之中。故此，延伸至思想上层建筑，彻底的反封建力作一直没有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可以看到，泰国文学在本质上继承了其政治上的特点。众所周知，伴随着西方殖民侵略而来的，就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入侵，而其先锋首先是宗教的传入，传教不过是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一种方式或工具。在泰国的这些传教士这样解释自己的责任：“我们要让暹罗人知道，暹罗人民注定永远落后，如果他们不改信基督教，不接受基督教国家的保护的话”。宗教的传播客观上就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流布。然而，泰国的近代教育是取法西方的，也就不得不大量引进西方文化、近代科学、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同时泰国的改革也是从上层社会开始的，统治阶级基于自身利益，在借鉴过程中是有选择性的。五世王前期，文学依然传承自泰国传统文学的主流，作品有两类：中国历史演义故事和泰国的诗歌故事，即娱乐性故事，情节一般都关乎战斗和爱情。但是到了五世王末

期，由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旧有的文学形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社会的解读和认识，人们开始把目光放到了西方翻译文学作品上面来，认为那些作品与变化了的生活更接近，于是，很多西方式的文艺类散文开始出现在普遍发行的报纸上，内容多是故事、传奇或者赏玩文章，可概括为六大类：生活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惊险小说、幽默小说和科学小说。这其中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五世王支持的皇家图书馆办的杂志《瓦奇拉奄维塞》，作品包括创作和翻译，作者和译者均为皇家图书馆委员，因此内容多涉及各种案件和法律及法学家的故事，意在用曲折的情节吸引读者。而1900年由披耶素林翻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英国女作家玛丽考勒莉（Marei Corelli）的《宛德达》（Vandetta）。虽然作者和作品都不能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能与英国公认的知名作家及作品同日而语，但是却让我们了解到翻译家的审美取向：即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性并不是他们所要追求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永远才是吸引读者眼球的法宝。这些更进一步反映了泰国近代文学的特点：基于社会变革的不彻底性，取法西方文学不当。而这一弱点也造成后来泰国短篇和长篇小说的诞生都延续了这一“传统”：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代出版的泰国长篇小说《并非仇敌》，内容就是讲述一个多妻的男人，他的一个妻子与别人有染，男人另娶新妻，结果那个妻子又回心转意，后共同生活的故事。作品完全是封建意识和封建趣味的流露，没有任何近代先进思想。这种一味迎合小市民口味的泰国文学必然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小说在当时是乏人关注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泰国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禁锢一直制约着泰国文学的发展。1941年，泰军人政府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实行排华，向英美宣战。战后，百废待兴的泰国不得不给英国一定的战争赔偿，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使一些泰国知识分子对未来充满悲观失望，同时对现实当局不满。同时，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泰国的传播，一部分进步作家向前迈进，在自己的作品中明确提出：“社会的主人是人民”的进步思想。文艺理论家尼绍瓦蓬（1918-）等还提出“艺术为人生”的进步口号。在这种大趋势中，泰国进步作家相继翻译了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鲁迅、茅盾、老舍、巴金、郭沫若、曹禺等人的作品。

这些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呼唤民众觉醒的新文学作品在泰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号称中国通的索古拉玛洛赫（1908-1978）的两篇小说《北京—难忘的城市》（1940年），《中国自由军》（1950年）就是取材于中国、以中国为背景写就的小说，他还称：“胡适是我的老师，对胡适十分景仰”，由此可见其所受中国作家影响之深。

泰国国内还有一支不得不提的创作生力军，那就是根植于中国新文学并在泰国本土萌芽的泰华文学。泰华文学起源于20世纪初，从泰华文学史来看，《中华民报》的文艺副刊《纪事珠》及其发表的数篇当地华侨华人的作品可视为泰华文学的起点，但就现存的图书资料看，最早的泰华文学著作应是出版于1933年的林蝶衣的新诗集《破梦集》、短篇小说集《扁豆花》、符先开等人的新诗集《孤霞》等，“五四”新文学运动将泰华文学推向新的历史阶段，继承和发扬着“五四”精神，并不断茁壮成长。三十年代，泰京（曼谷）就有几份华文报刊的文艺副刊相继出现，并涌现出了一些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批判并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优秀作品，如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小说集《迴风》，小品文集《梅集》等。三十年代，泰华文坛曾举办过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学盛事，即1936年为追悼鲁迅先生逝世而掀起的一场文学缅怀活动，规模空前，当时共有63家文学组织和团体参加了此次活动，创作并留下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之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泰华作家们创作的精神支柱和灵感源泉。如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作品就对泰华文学界的影响颇深，并对泰华作家以深远影响，在之后的五、六十年代，泰华文学界相继出现了一些表现泰华社会人生百态的文学佳作，其中，陈竹的《三聘姑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反观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产生了早期的维新思想，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由“器物”层次发展到“制度”层次。康有为、梁启超继承并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他们把西学和中学

糅和起来，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主张通过改良手段，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康、梁维新思想的传播及实践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在当时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二十世纪初，更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抱着救国救民的热情和责任感，以“科学”、“民主”为目标，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开展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许多报国无门的文人学者带着寻求真理的理想踏上了留学国外的路途，除了英法等国外，俄国也是他们的选择，俄国的伟大思想家对他们也影响颇深。基于寻求救国之路的苦心壮志，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反帝反封建、寻求民主、自由，批判社会弊病的文学作品，并通过自身努力将这些作品翻译并介绍到祖国，意在唤醒愚昧的国民。回国后，又以手中犀利的笔触及社会各个角落，为苦难的祖国疗伤解毒，以“危难之中，舍我其谁”的精神，力图解救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子民。这种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其实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不管是屈原、杜甫，还是鲁迅、巴金，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是炎黄子孙精神的一种继承。

作为苦心关注社会和民众命运的中国知识阶层的一份子，巴金先生在他的《一封乡书》里写道：“不要把我当做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我今年 87 岁，今天回顾过去，说不上失败，也谈不到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于享受……”，文坛泰斗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巴金早年就留学法国，使用最纯熟的就是英语，故此，他的创作接近欧美文学的风格。他对那些在创作中表现出同情劳动大众、匡扶主持社会正义的西方作家都表示出了好感。他曾经怀着敬意提到的欧美作家，包括英语作家狄更斯、王尔德、惠特曼、莎士比亚；法语作家卢梭、伏尔泰、雨果、罗曼罗兰、左拉等。巴金选择来阅读和受到激励的主要是干预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之代表作，其中左拉的《萌芽》对巴金的影响特别明显，巴金描写矿工的小说《雪》，就是借鉴了左拉来表现他对不合理的社会最强烈的抗议。而罗曼罗兰的人道主

义、道德的完整性和英勇精神也吸引着巴金，他们有着同样的严肃和使命感，罗曼罗兰《约翰 克里斯多夫》中的德国音乐家和巴金笔下的青年革命者内心中都充满了对理想的热情探索；他们并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由信仰支配着，把它看得高于一切。相似之处还有，约翰克里斯多夫从家乡出走到了巴黎，而《家》中的高觉慧从成都出走到了上海。然而，罗笔下的约翰希望通过艺术来服务于人民，巴金笔下的青年希望通过社会革命为同胞来争取更好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与俄国文学中的青年有着相似之处：巴金的《家》里有一个片段，那时一个法国教员对觉慧说，“法国青年在你们这样的年纪是不懂得悲哀的”。显然一个俄国教师是不可能这样讲到俄国青年的，因为俄国青年当时也同样被悲哀压倒了，也同样感到他们肩负着对国家的责任。巴金先生因为看到眼前各种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知民众的苦痛而忧心，所以，他也要求着革命，自然他的作品时刻流露着时代的人间疾苦，以及不断抗争、冲破枷锁、寻求出路的厉声呼唤。

第二节 文化背景的比较

众所周知，泰国人以温和善良著称于世界，这与泰国人的佛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佛教是泰国世代相传的传统宗教，也是泰国人的生活重心。在全国六千七百万人口中，佛教徒占了百分之九十五。由于历代国王都尊崇并积极护持佛教，因此佛教成为泰国国教，僧侣备受敬重。通常泰国男子年满二十岁，至少要出家三个月，每天清晨出外托钵乞食，并且过午不食。一般家庭通常设有佛龕，外出时也佩戴佛牌项链以祈护佑。每日清晨，很多泰国人都准备好食物，出外斋僧。每逢节假日都会到寺院或供养钱物、或禅修、或做义工等，佛教信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点滴之中。

在佛教的三大系统传承当中，北传（大乘）佛教、藏传（金刚乘）佛教在亚洲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南传（小乘）佛教则主要在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中流传。在中国广东的潮汕地区，本土的潮汕人主要崇拜佛祖（即如来佛）和观音菩萨。潮汕人信佛，也信道。佛与道

在潮汕地区民间没有什么界限，被统称为神佛或神明。而泰国华人社会是一个带有浓厚潮汕风情的社会，在六百万华人中，祖籍广东的占五百六十七万，占华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其中潮州人四百四十一万，是华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泰国的潮汕人及其后裔的佛教信仰同中国本土的潮汕人大致相同，虽然泰国人信仰的主要是南传佛教，但是泰国潮汕人却依然信仰中国北传佛教，这在泰国被称为“华宗”，泰文名为（song jin nigai 泰文英译）。“华宗”是以泰国华人生存发展的历史为背景而形成的，同时以华人社会为依托而发展，体现出泰国华人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心理。可以认为，华宗在泰国的生根发芽其实就是一个与泰国文化和社会相融合的渐进过程。在南传佛教环境中，华宗保持使用北传佛教经典，包括唱诵、早晚课仪规、素食等。然而，生活在“黄袍佛国”之国度，“华宗”自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南传佛教的影响，华人子弟也有了选择“华宗”佛寺出家的传统。

佛教思想深入人心，主导了泰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成为了其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而位于曼谷的华人聚居区三聘街，就是具有这种文化背景的典型之地。虽然《三聘姑娘》中没有直接提及华人的宗教信仰，但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明显反映了作者的文化思维：即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改良社会的手段较为温和。

《三》中曾多次提及《家》这部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也以觉慧和琴作为自身行为的准则，可以看出，作者陈行是以巴金先生作为自己的楷模的。但是，仔细阅读作品不难发现，陈行在仰慕和追随巴金先生的同时，也深受泰华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在处理家庭矛盾的问题上就很明显。作为觉慧化身的四姑娘珮珠，是具有先进思想的华裔青年的代表，她勇敢、热情，敢于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势力，敢于走自己的路。她一直不断地努力，帮助她同父异母的大姐宝珠，认清并力图克服封建思想的毒害，不听任父亲安排，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然而，在大姐决定和自己心爱的人建立婚姻关系时，明明知道父亲可能会反对且阻止他们的行为，珮珠并没有用觉慧的想法让大姐离家出走，而是鼓励大姐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说服他老人家”。在“说服”的过程中，大姐在父亲软硬兼施的手法下，一时语塞，失去了抗争的勇气，这时，珮珠又代大姐与父亲辩争，她责怪父

母对她同父同母的二姐和三哥的放纵，也认为“爸爸对大姐的管束又过分太严厉了，平日几乎完全不允许大姐做她一件她自己快意的事来”，她甚至请求爸爸说：“爸爸，你就答应了大姐的请求吧！爸爸，你就成全大姐这个心愿吧！爸爸，我也请求你！我帮大姐请求你！我们两个人一齐请求你！”这一连串的请求，是一个女儿对父亲发出的动人肺腑的劝解，是女儿乞求父亲理解的呼唤。试想如果觉慧这样请求他的爷爷——高老太爷，爷爷会回心转意吗？会同意他的请求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但是珮珠的父亲——“兴记头”却默认了，他只是“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负气地挥着手道‘去吧，去吧！儿女养大了，我再也没有能力来管教了。要去的，都给我去吧！’”。“兴记头”作为一个封建家长形象的代表，在这时也在心里承认了女儿的“充足理由”，甚至在“心里信服”，只是碍于“旧头脑父亲所有的一种尊严”默认了女儿的请求，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旧有封建思想和制度，其残存于泰华社会的根基已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物质文明的双重夹击下，产生了动摇。

前文曾提及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亚洲各国除了在政治上控制，经济上也采取了各种掠夺政策。四、五十年代的泰国，一直采取“排华、亲美”的政策，“三聘街”作为一条古老的街道，自然也最先涌入了资本主义的“气息”。作品一开头，作者就这样描写了古老的“三聘街”：“三聘街是一条古老的旧式街道，两旁商店栉比林立。店面相对不过咫尺，屋檐伸接，…商店和街道同样的古老，但这里却摆满了现代文明的货品，都是资本雄厚的大批发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熏陶”了这里的华裔商贩，“兴记号”这个原先以经营土布为主的店铺，现在也变成以经营洋布为主了；而“兴记头”为了一两个懂得洋文可以和洋人打交道的心腹助手，也将他的二姑娘秀珠和唯一的儿子绍基送进了一家洋人开办的洋学校去读洋文。虽然他对二姑娘和儿子过度浪漫的行为“头痛”、“看不顺眼”，但是，“他的二姑娘着实也帮了父亲不少忙，做成了好几宗好生意”，于是，他这个做父亲的也就“无话可说了”。伴随着西方的物质文明，就是所谓的西方文化和对其盲目的崇拜，这种氛围就弥漫在古老的“三聘街”中，虽然这里还是住着诸位“阿婶”、“阿姆”、“阿姑”和“阿妗”，但是，她们

眼中的秀珠已经美丽得“打扮起来就像一个红毛（对西方人的称呼）姑娘了”，而秀珠也很满意她们对她的夸奖；她们甚至认为秀珠的对象李大荣长相英俊，就像“电戏里的红毛小生”，恭喜秀珠的母亲得了个“红毛女婿”。而以“时尚”的秀珠和她“风流倜傥”的未婚夫李大荣为代表的一些华裔青年追求所谓的“自由”，秀珠明知大荣同时与多个女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却佯装不知，一心只想着他家的地位和财产，想着婚后自己少奶奶的奢华生活。大荣也容忍秀珠有多位男友，还遵循着古老的婚丧嫁娶传统准备迎娶她，以求一个门当户对，经济实力相当的婚姻。他们自以为自由就是放荡的生活方式、充裕的财富和金钱挥霍，其实他们空虚的心灵早已被无止境的欲望和虚荣的枷锁牢牢禁锢，成为了所谓西方文明的牺牲品。这与泰国社会大众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是不无关系的，如前所述，由于泰国形式上保持了独立，成为东南亚唯一一个独立的国家，故此，上至皇亲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西方的态度友好大过于憎恶，更何况物质文明也确实给泰国人带来了一些实惠，再加上泰国人过于乐观的处世态度，使当时的泰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盲目向往西方、模仿西方、崇拜西方的扭曲心理。

当时的泰国华人社会在整个泰国社会中明显缺乏话语权与影响力，其地位可以说是无足轻重，这不但与泰国政府“排华亲美”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与其祖籍国——中国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之后，1945后，又陷入了内战之中，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无暇顾及到那些远在海外的子女。这时的泰华社会就像一个生活在异国的“游子”，没有了母亲的关爱，既游离于祖籍国之外，而又浪迹于客居国，缺少应有的归属感而被当作一个“边缘人”。当时的泰华社会在受到资本主义思想撞击的同时，还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这里有被父权、兄权统治的封建家庭，“兴记号”中的父亲“兴记头”就是一手掌管大女儿宝珠命运的“封建家长”的典型代表，他不但以家庭的生意需要一个可以放心的人为理由，让大女儿宝珠学习管理财务，让二女儿秀珠和唯一的儿子绍基进了洋文学校学习洋文，而且利用自己的女儿为砝码，试图巩固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使得孝顺听话的女儿——宝珠虽然早已有了心上人，却年过三十还小姑独处，内心备受煎熬；对二女儿——秀珠唯利是图的想法更是

采取了纵容的态度。父权至上的丑恶嘴脸在秀铢的婚事风波中被描绘得惟妙惟肖：秀铢的未婚夫——大荣已经暗地里登记结婚，秀铢知道真相后拒绝跟来迎娶她的大荣上轿，一心想让大荣当面办理结婚手续，怕自己失去在婆家的地位。在这个紧要关头，大荣的父亲——李合隆老座山（座山，潮州方言，意为老板），另一个父权为上的家庭的代表，得知儿子的行径后，不但不以为耻，反而“用手把胸膛拍的发响，夸口说：‘这完全是过虑！我花掉这么多钱来娶媳妇，又是我亲自出面主婚的，这事还会弄假的吗？你回去告诉他尽可以放心！一切有我负责！’”，“你叫他的女儿先上轿，以后的事一切由我作主，包他的女儿是个十足的李家三媳妇。…我的话一句就是一句”。而“兴记头”听了“老座山”话，认为“有钱人三妻四妾原是常事，大荣有本领要娶多少位，我不敢反对，可是大小名次，总要事先弄个清楚明白才好！…最好要求老座山把他火碓的股份中抹出十保升来给秀铢作为保证…”。可想而知，这个“交易”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同样视钱财为生命的老座山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老座山”最后破口大骂，并告诉他的儿子“我会另娶一个比这更好一万倍的女人给他做媳妇！”就结束了这场婚姻“交易”。说到底，不管是大荣，还是秀铢，也不管他们报着怎样的目的恋爱、结婚，他们是不能真正决定自己命运的，他们都是“封建家长制”的牺牲品，都是父亲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在“三聘街”，这样的家长、这样的青年比比皆是，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即使没有了父亲，兄长一样是压在她们头上的大山，是控制她们命运的“操作者”。这里有被父亲禁止穿裙子、不准多说一句话，不准多笑，因为与家中的心贤（潮州方言，指记账员）恋爱而被家人毒打，最后上吊自杀的“玉香”；也有个性、处境和遭遇都与宝珠相似，全家大权都由势力、狡猾的大哥一手掌握的“丽云”…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还是渗入到了这个黑暗的角落，《家》等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些作品被珮珠、张明翰等先进青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他们渴望像勇敢、热情的觉慧一样，敢于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势力，走自己的路。珮珠更觉得“琴是女性的好榜样”，甚至“有点像梅表姐”的宝珠也在时常翻看这本书，而这本书也确实激励了这些青年，使他们重新考虑并掌控自

己的命运，使宝珠为了自己的命运起来与封建家长抗争，使珮珠等一些更年轻的新一代有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然而，如果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星火燎原之势燃遍了整个中国大地的话，那么，泰华社会的这点“星星之火”火种却未能在整个华人世界中蔓延传播开来，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当时整个泰国社会“排华亲美”的大环境，更不能不考虑到华人在泰国社会中的微妙处境。所以当时的青年虽然从中国的新思想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激励，但是这种思想并没有在泰华社会中形成主流，没有在青年中形成一定的组织和规模，故此，他们在完成了自身所谓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后，并不清楚应该怎样来改变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封建思想和传统，改变西方文明给社会带来的沉迷和腐败，更不知道如何改变华人在泰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这些也正是作者留给后人的思考。

